

中国城镇化的消费效应研究

李通屏 程 胜 倪 琳 钱 佳

【摘 要】文章以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利用全国各省份城镇化和消费方面的相关数据,分析城镇化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1978~2010年城镇化对最终消费率的提高影响不大。但在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并把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水平的乘积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的情况下,城镇化对最终消费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且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差距的共同作用对消费率的影响为负。(2)城镇化与消费率反向变动的事实与钱纳里“标准模型”是一致的,在当今世界并非特例。而通过加快城镇化推动消费率提高仅仅是一种特例,只出现在特定阶段。文章认为,实施城镇化新政,必须改变传统的城镇化推进模式,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努力实现城镇化和扩大消费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城镇化 消费率 区域差异 消费效应

【作 者】李通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程 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倪 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钱 佳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又主要表现在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较快增加的同时,消费率在低水平上持续下降。中央政府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但这种趋势仍未得到遏制,消费率由1998年的59.6%下降到2010年的48.2%,2007年以来持续低于50%(国家统计局,2012)。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城镇化与内需和消费的关系(樊纲、王小鲁,2004;李通屏、成金华,2005;李朴民等,2009;辜胜阻等,2009)。从城镇化理论和消费理论的发展来看,二者都有大量文献。如以佩鲁(Perroux, 1955)、缪尔达尔(Myrdal, 1957)、赫希曼(Hirschman, 1958)、克鲁格曼(Krugman, 1991)等为代表的非均衡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城镇化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效用,而不关心消费与消费率,强调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虽然我们可以从二元结构(Lewis, 1954)、经济增长阶段(Rostow, 1990)和发展的结构效应(西蒙·库兹涅茨,1985)等文献中推断城镇化和消费的关系,钱纳里等(1998)也通过对发展模式的研究,分析了包括城市化水平在内的投资率、私人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之间关系的变动。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

代以前,且城市化和消费的关系也不是他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消费理论在凯恩斯以来虽然得到很大发展,研究焦点经过了确定性消费理论到不确定性下的消费理论,消费函数从刻画短视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假说到刻画前瞻性消费者的前瞻性消费理论,效用函数从二次型发展到凸函数(安格斯·迪顿等,2005)。但总的来看,消费理论不涉及城市化,主流的城市和城市化理论也没有直接关注消费。基于上述理论背景和中国城镇化新政与扩大消费的现实,本文试图利用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对城镇化的消费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城镇化过程中的消费变动规律。

一、中国城镇化与消费率变动的一般观察

根据人口普查,可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分为 1982 年之前、1982~1990 年、1990~2000 年和 2000~2010 年 4 个时期。把城镇化历程和消费率变动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发现以下事实。

(一) 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而消费率越来越低

1980 年之前,城镇化水平在 20%以下,1953~1980 年,年均消费率为 69.9%。从 1982 年

表 1 1953~2010 年中国城镇化历程与消费变动

年份	城镇人口 (万人)	农村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比例 (%)	农村人口比例 (%)	消费率
1953	7726	50534	13.26	86.74	75.8*
1964	12710	56748	18.30	82.70	77.3**
1982	21082	79736	20.91	79.09	66.5
1990	29971	83397	26.44	73.56	62.5
2000	45844	80739	36.22	63.78	62.3
2010	66557	67415	49.68	50.32	48.2

注:* 指“一五”时期(1953~1957 年)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消费基金所占比例;** 指 1963~1965 年消费基金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率(国家统计局,1993)。城镇和农村人口及比例来源于历次人口普查,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的消费率数据来源于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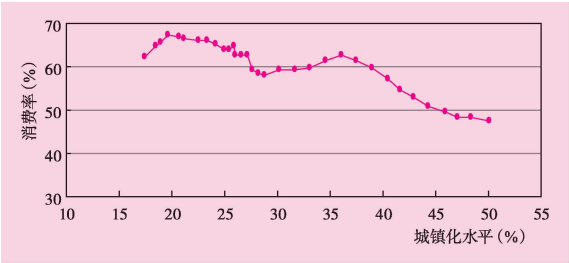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0 年中国城镇化和消费率变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年。

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到 2010 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城镇化水平从 20.91%上升到 49.68%的过程中,消费率下降接近 20 个百分点(见表 1)。

(二) 城镇化速度越快,消费率下降速度越快

1953~1980 年,城镇化水平在 13.26%和 19.75%之间波动,1958~1960 年既是改革开放前城镇化的

最高水平和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也是投资、消费关系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即 20 世纪 80 年代前投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的时期,进入 21 世纪的 10 年,是改革以来城镇化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也是消费率下降最快的时期,消费率由略高于 60%下降到 50%以下(见图 1),1978~2010 年中国城镇化和消费率变动

关系的散点图反映出两者之间一高一低、一快一慢的关系。

(三) 从区域分布看,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消费率低,而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消费率高

城镇化水平和各地区的消费率分布尽管不太规则,但这种匹配模式仍然明显。1990 年城镇化水平在 20% 以下的 9 个地区,消费率都在 65% 以上,其中最高的接近 80%;而城镇化水平在 60% 以上的 3 个地区,消费率都在 65% 以下,高城镇化—低消费率和低城镇化—高消费率的特点在全国 29 个省份中比较明显,而低城镇化—低消费率的只有 1 个地区。2000 年的分布图也大致符合这一特征,2010 年,去掉两个极端点(高城镇化—高消费率,城镇化水平在 80% 以上,消费率在 55% 左右),其他 29 个地区总体符合这个特征。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中国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消费率的散点分布如图 2 所示。

(四) 城镇化的区域差异与消费率变化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很快,但地区差异非常明显。按照城镇化水平最高与最低、速度最快与最慢的四类地区进行考察(见表 2),可以发现:

(1) 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均显著下降。重庆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分别下降 12.4 和 14.2 个百分点,在原本很低的基础上,江苏下降 6.8 和 2.1 个百分点,河北下降 5.0 和 3.2 个百分点。而城镇化速度最慢的地区,消费率有升有降,变化方向不确定。如上海分别上升 9.0 和 12.1 个百分点,西藏最终消费率上升而居民消费率下降。(2) 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北京,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的上升趋势明显。如北京上升 0.3 和 6.7 个百分点,而其他两个地区,则双双下降,天津分别下降 9.6 和 10.8 个百分点,广东下降 2.6 和 8.5 个百分点;而城镇化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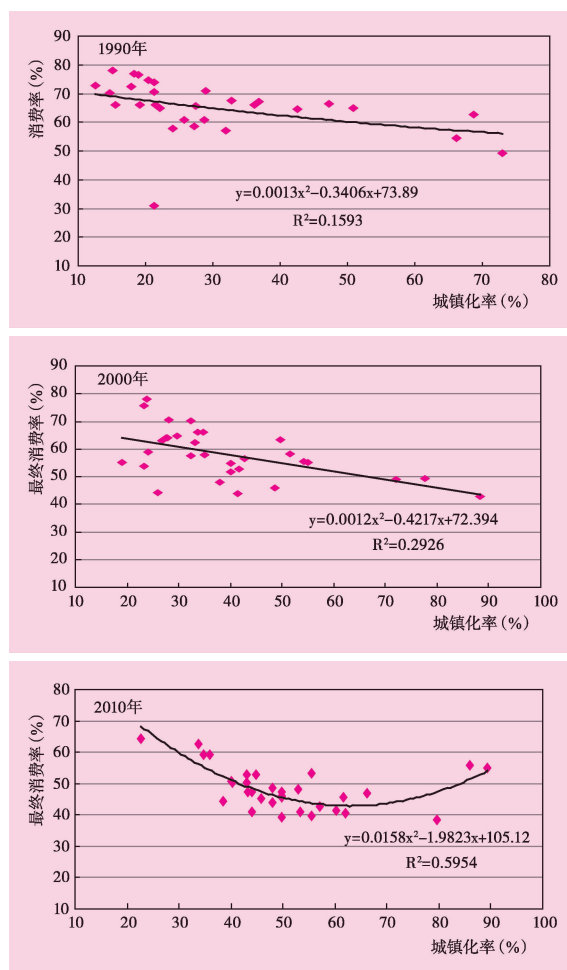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各地区城镇化和消费率

注:图中 1990 年的消费率与 2000 年和 2010 年有所不同,1990 年是消费额与国民收入使用额的百分比,而 2000 年和 2010 年则是最终消费与支出法计算的 GDP 的百分比。消费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化水平数据分别是四普、五普和六普数据。

表 2 2010 年城镇化水平最高与最低、速度最快与最慢地区的消费率比较

%

地 区	城镇化水平			居民消费率	最终消费率
	2000 年	2010 年	变动幅度		
全 国	36.22	49.68	13.46	49.2~33.8 ↓	62.3~47.4 ↓
速度最快					
重庆	33.09	53.02	19.93	47.6~35.2 ↓	62.3~48.1 ↓
江苏	41.49	60.22	18.73	33.2~26.4 ↓	43.7~41.6 ↓
河北	26.08	43.94	17.86	33.1~28.1 ↓	44.0~40.8 ↓
江西	27.67	44.06	16.39	49.9~37.5 ↓	64.1~47.5 ↓
速度最慢					
上海	88.31	89.30	0.99	33.4~42.4 ↑	42.8~54.9 ↑
吉林	49.68	53.35	3.67	48.5~27.5 ↓	63.4~41.1 ↓
西藏	18.93	22.67	3.74	39.2~26.2 ↓	55.3~64.3 ↑
黑龙江	51.54	55.56	4.02	43.4~32.9 ↓	58.3~53.1 ↓
水平最高					
上海	88.31	89.30	0.99	33.4~42.4 ↑	42.8~54.9 ↑
北京	77.54	85.96	8.42	32.6~32.9 ↑	49.3~56.0 ↑
天津	71.99	79.55	7.56	34.0~24.4 ↓	49.1~38.3 ↓
广东	55.00	66.18	11.18	38.9~36.3 ↓	55.2~46.7 ↓
水平最低					
西藏	18.93	22.67	3.74	39.2~26.2 ↓	55.3~64.3 ↑
贵州	23.87	33.81	9.94	60.4~46.4 ↓	78.0~62.7 ↓
云南	23.36	34.70	11.34	54.6~42.7 ↓	75.8~59.4 ↓
甘肃	24.01	35.97	11.96	45.0~38.0 ↓	58.7~59.1 ↑

注：城镇化数据来源于五普、六普数据，消费率数据来源于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最低的 4 个地区，居民消费率都在下降，但其中 2 个地区的最终消费率在上升（如西藏和甘肃）。（3）城镇化水平高、速度平稳的东北地区，居民消费率、最终消费率明显下降值得关注。如吉林分别下降 21.0 和 22.3 个百分点，黑龙江分别下降 10.5 和 5.2 个百分点。西藏、贵州、云南和甘肃与其他省份比较，出现的“低水平城镇化—高消费率”模式同样值得关注。

二、消费率模型

消费率即最终消费率，它包括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两部分，前者表示居民消费和支出法 GDP 的比率，后者表示政府支出和支出法 GDP 的比率，其公式为：

$$fcon = hcon + gov = \frac{HC}{GDP} + \frac{GOV}{GDP} = \frac{HC + GOV}{GDP} = \frac{FC}{GDP} \tag{1}$$

其中， $HC = HRC + HUC$ 。根据最终消费的含义，最终消费公式为：

$$FC = HRC + HUC + GOV = Rpop \times rc + Upop \times uc + GOV \tag{2}$$

式（2）表示最终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总和，而城乡居民消费同城乡人口存在函数关系。式中， $fcon$ 表示最终消费率， $hcon$ 表示居民消费率， gov 表示政府消费率， HC 表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 FC 表示最终消费总额， HRC 、 HUC 、 GOV 依次表示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城镇居民总消费和政府支出，用 POP 表示总人口， $Rpop$ 、 $Upop$ 分别表示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 rc 、 uc 分别表示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用 ur 表示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那么， $1 - ur$ 表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将式（1）和式（2）结合，则有：

$$\begin{aligned} f_{con} &= \frac{R_{pop} \times rc}{GDP} + \frac{U_{pop} \times uc}{GDP} + gov = \frac{POP \times (1-ur) \times rc + POP \times ur \times uc}{GDP} + gov \\ &= \frac{(1-ur) \times rc + ur \times uc}{\frac{GDP}{POP}} + gov = \frac{(1-ur) \times rc + ur \times uc}{gdp} + gov \end{aligned} \quad (3)$$

式中, gdp 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式(3)说明,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城镇化水平对消费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由式(3)不难得出:

$$f_{con} = \frac{rc + ur(uc - rc)}{gdp} + gov = \frac{rc + ur \times rc \left(\frac{uc}{rc} - 1 \right)}{gdp} + gov \quad (4)$$

这样就建立起了最终消费率和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式。令 $dc = \left(\frac{uc}{rc} - 1 \right)$, 进而有:

$$f_{con} = \frac{rc + ur \times rc \times dc}{gdp} + gov = \frac{rc + (1 + ur \times dc)}{gdp} + gov \quad (5)$$

从式(5)可知:(1)当 $dc \leq 0$, 即城乡不存在消费差距,最终消费率和城镇化水平高低无关,或者城镇化对提高消费率无效。(2)当 $dc > 0$ 时,即城镇的消费水平高于农村,消费率的决定因素是 ur 、 dc 、 gdp ,特别是“ $ur \times dc$ ”、 gdp 、 gov 决定最终消费率,也就是说,城镇化和城乡差距共同决定消费率,在人均 GDP、政府消费率给定的情况下,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化和消费差距的乘积值越大,消费率越高。(3)根据模型推导,城镇化水平与消费率变动存在正向关系的前提是城乡差距的事实存在。

三、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中国城镇化水平数据来源于历次人口普查,其他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GDP、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 1978 年城乡价格水平为基准(1978 年价格水平 = 100),求出历年的实际值,分别用 UCPI 和 RCPI 表示城镇和农村的消费物价指数。1990 年以前的 RCPI 由于数据缺失,我们以全国为基础,即假定 1990 年以前 $CPI = RCPI = 100$,以此求出历年城乡的实际消费水平,各变量界定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可知,30 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消费率、人均 GDP、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的消费及城乡差距都是非平稳变量,消费率的均值为 59.7%,标准差为 5.9%,其他一些变量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二) 实证分析及其结果

1. 城镇化变动对消费率的长期影响

城镇化水平、人均 GDP、政府消费率、城乡收入差距及城镇化和收入差距的乘积所形成的变量对最终消费率有很好的解释,其中人均 GDP,由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构成的变量

表 3 1978~2010 年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fcon(%)	lngdp	gov(%)	ur(%)	di(rrdi=1)	dc(rrc=1)	ruc(元/人)	rrc(元/人)
均值	59.7	7.3	14.2	31.9	2.3	2.5	988.3	385.4
中位值	61.3	7.2	14.3	28.8	2.3	2.5	831.0	335.6
最大值	67.1	8.9	16.1	50.0	3.0	3.0	2337.6	847.7
最小值	47.4	5.9	12.8	17.9	1.7	2.1	383.0	132.0
标准差	5.9	0.9	0.8	9.4	0.4	0.3	550.6	189.0

注:1979 年数据缺失。fcon、gdp、gov、ur 同公式(1)至公式(5),ruc、rrc 分别表示城镇居民的
实际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以 1978 年的价格水平为 100),dc 与前述公式中稍有不同,仅表示城镇居民与农村
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比率,di 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率。

对消费率产生了显著的负作用,而城镇化、政府消费率、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率的正作用被
产生负作用的两个变量抵消(见表 4 模型一),由此使最终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

为更接近原模型的设定,我们把城乡消费差距引入消费率模型进行回归(见表 4 模型
三),结果显示,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变动对消费差距的交互影
响没有通过 t 检验,但人均 GDP、政府消费率依然非常显著,说明城镇化水平不是影响消费
率的重要因素。剔除城镇化与城乡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交互作用,城镇化水
平均未通过 t 检验(见表 4 的模型二和模型四),说明对消费率变动的解释能力不足,而其
其他几个变量均显著,人均 GDP、收入差距、消费差距对消费率有显著的负作用,而政府消费
率为正。

2.城镇化变动对消费率的短期影响

在上述协整分析的基础上,短期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4 1978~2010 年最终消费率的长期变动

	模型一	模型二(剔除 ur × di)	模型三	模型四(剔除 ur × dc)
常数项	94.06(11.76)	88.64(8.06)	89.09(4.98)	97.51(6.71)
ur	1.93(5.35)	0.28(1.27)	1.09(1.20)	0.39(1.37)
lngdp	-13.37(-6.39)	-7.03(-3.01)	-11.06(-3.13)	-9.50(-3.21)
gov	1.29(5.86)	1.77(6.38)	1.93(5.61)	1.94(5.68)
di	5.79(2.58)	-5.07(-5.11)		
dc			2.23(0.32)	-3.44(-2.74)
ur × di	-0.39(-5.10)			
ur × dc			-0.21(-0.82)	
Adj.R ²	0.9764	0.9546	0.9626	0.9302
F 统计值	257.9396	163.9866	82.5181	104.2608
显著性(F 统计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D.W.统计值	1.5171	0.7518	1.1386	0.6890

注: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模型一、模型二为包含收入差距的模型;模型三、模型四为包含消费差距
的模型。

从表 5 可以看出,模型五中,人均 GDP、政府消费率、滞后变量和城镇化水平在误差修正模型中通过了检验,短期内城镇化对消费率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收入差距、城镇化和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对消费率变动的影响不大。模型六中,仅人均 GDP、政府消费率和误差修正项通过了检验,但城镇化水平、消费差距、消费差距和城镇化水平交互作用则没有通过检验。通过两组模型实证结果比较发现,城镇化对于消费率变动的显著解释仅存在于收入差距模型。城镇化对于消费率变动的边际效应依赖于收入差距虽然得到证实,但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对于消费率变动呈负向关系与模型推导相悖,说明中国城镇化与消费率变动关系可能存在阶段性(即城镇化与消费率正向变动的拐点尚未出现)。

3.中国城镇化没有促进消费率提升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只有在用收入差距衡量同时又考虑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城镇化才能促进最终消费率的提升,但中国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对消费率的影响为负。在其他情况下,城镇化对提升消费率的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与钱纳里等(1975)“标准模型”的趋势一致,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而私人消费率下降。中国的特殊性仅仅在于下降的幅度过大。中国城镇化与消费率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当今世界并非特例。如图 3 所示,2010 年 106 个国家的情况,城镇化水平和最终消费率的联系比较松散,对最终消费率的变化只有微弱的解释力。若不考虑这个解释力,按图 3 中的回归方程计算,城镇化水平提高到 67.34% $[1.239/(0.0092 \times 2)]$ 时,最终消费率才会提升。按照中国各地区 2010 年的回归方程,拐点在城镇化水平达到 62.73% $[1.9823/(0.0158 \times 2)]$ 时出现。

中外城市化和消费率变动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推动消费率的提高只出现在特定阶段。把解决消费不足、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希望寄托在快速城镇化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从近期看仍然矛盾重重。

第一,城镇化驱动消费需求有时滞。由于城镇化水平长期偏低,中国推动城镇

表 5 1978~2010 年最终消费率变动的误差修正模型

	模型五	模型六
常数项	0.40(1.11)	0.56(1.10)
D(ur)	1.99(3.53)	1.70(1.93)
D(lngdp)	-24.57(-5.72)	-25.50(-4.31)
D(gov)	0.57(2.60)	0.95(3.46)
D(di)	0.11(0.03)	
D(ur × di)	-0.17(-1.32)	
D(dc)		1.13(0.19)
D(ur × dc)		-0.11(-0.54)
ET(-1)	-1.28(-6.06)	-0.64(-3.85)
Adj.R ²	0.7759	0.5669
D.W.统计值	1.5986	1.6920
F 统计值	18.3068	7.5442

注: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模型五包含收入差距,模型六包含消费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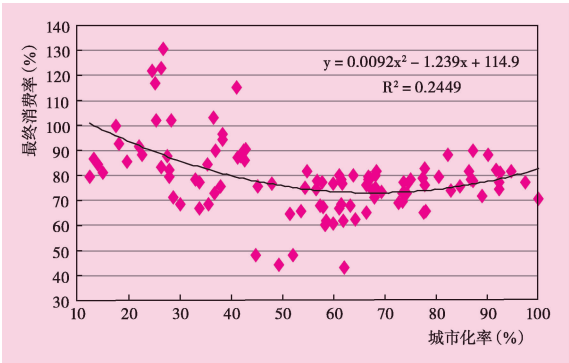


图 3 2010 年世界 106 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最终消费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2011。

化的方式主要是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在城市化前期,城市建设、工业、服务业需要大量资本投资,居民消费服从于资本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往往被人为压低。应该说,这种挤占在城镇化的特定阶段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因为经济发展初期需要更多资本满足经济起飞的积累要求。因此,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消费率下降。

第二,“半城市化”难以启动消费。在人口普查数据中,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被列为城镇人口,其中包括大量农村户籍人口,他们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虽然这部分群体的消费习惯和行为受到城市的影响,但大多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以“小农”方式进行消费。

第三,城市高房价占用了居民过多收入,挤占最终消费支出。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最终消费包括了所有的消费性支出。如住房消费不是指购房费用,购房费用属于非消费性支出。在前几年流行的经营城市思路下,对城市的过度开发和土地制度的混乱,间接造成了以住房支出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成本的非合理增长,从而大量挤占居民消费支出,造成流动性约束,当期消费受到较大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城镇化与消费率变动,与钱纳里等(1975)“标准模型”的趋势一致,也与当今世界的匹配模式相近。本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城镇化和收入差距对最终消费率的提高是有效的,而城镇化和收入差距对消费率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消费率被压低;如果不考虑城镇化和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城镇化提升消费率的作用不再显著。

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好地解释了2010年各地区的消费率差异,在综合考虑城乡差距的情况下,城镇化降低消费率的作用比提升消费率的作用更显著。消费率的迅速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均GDP提高的结果,而城镇化对消费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并不必然为正。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对消费需求挤占效应明显,而促进作用并未充分发挥。

城镇化和消费率变动的经验表明,通过城镇化提高消费率仅是一种特例。加快城镇化对消费率影响显著为正的命题仅是个案,而且在有限的、严格的意义上才成立。按照出现城镇化和消费率正向变动的“拐点”,从近期看,城镇化提高消费率的效应不会很大。

如何创造条件,降低城镇化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消费率下降,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城镇化实践与消费率变动的事实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树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观。加快城镇化对提高消费率是否更有效,取决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推进模式和城镇化的质量等方面。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非“一化”就灵,城镇化水平变动和投资率虽然有正关系,但与消费率之间的正关系,尚未找到相应的国际证据(李通屏、郭熙保,2011)。虽然城镇化发展和消费需求表现出正向关系,但城镇化对消费率的提升作用存在时滞。通过快速城镇化提升消费率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

第二,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稳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是选择刺激消费领域的依据之一。同时,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把扩大消费总量,提高消费率作为重要参考。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更多体现出以物为主,直接造成了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中还出现了处于“夹层”的农民工群体,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半城市化”现象,这种以物为主的城镇化肯定是低质量也是不可持续的。实施城镇化新政,必须改变传统的城镇化推进模式,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破解城镇化过程中的低消费之谜,努力实现城镇化和扩大消费的良性互动。

第三,加快实现城镇化战略的两个根本转变。一是从“增长导向型”向“民生导向型”转变。把人民作为推动城镇化的主体,摒弃紧盯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城市化战略,注重协调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二是加快实现由高城镇化—低消费率模式向高城镇化—高消费率模式转变,寻找破解“高城镇化—低消费率”的有效对策。城镇化水平高而消费率低的地区率先实现高城镇化—高消费率模式,并利用其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其他东部地区加快实现向高城镇化—高消费率模式转变。对那些低城镇化—消费率较高模式的地区,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要把民生优先型投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推进城镇化战略与就业创造、人民幸福紧密融合。鉴于城镇化过程中消费变动的实际效果,应慎重使用通过加快城镇化扩大消费的做法。

参考文献:

1. 安格斯·迪顿、约翰·米尔鲍尔(2005):《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龚志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樊纲、王小鲁(2004):《消费条件模型与各地区的消费条件指数》,《经济研究》,第5期。
3. 辜胜阻(2009):《应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引擎》,《人民日报》,7月21日。
4. 李朴民等(2009):《加快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战略思考》,《宏观经济管理》,第11期。
5. 李通屏、成金华(2005):《城市化驱动投资与消费效应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6. 李通屏、郭熙保(2011):《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6期。
7. 钱纳里、赛尔昆(1988):《发展的型式:1950~1970》,李新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8. 西蒙·库兹涅茨(1985):《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译,商务印书馆。
9. Harrison M. L.(1986), Consumption and Urban Theory: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on the Social Division of Welf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10: Issue2. pp.232-242.
10. Hirschman, A.O.(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 Krugman Paul(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9(3), pp.483-499.
12. Lewis W.A.(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Vol.22. pp.90-111.
13. Myrdal, G.(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Gerald Duckworth.
14. Rostow W.W.(1990),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朱 犁)